

「義新字虛書古」

介評

李振興

因為時有古今、地有南北、人有雅俗，彼此的語言難免有懸殊隔閡，而秦火焚書，簡冊殘餘錯落，文字難免有更替訛誤，後代的知識份子惟有藉助前儒的詮釋，方能使窒礙難解轉為渙然冰釋。而前儒詮釋的旁徵曲喻，不管是注疏抑是正義，無非是探究經典的古義、本義。一般詮釋不外採取三種方式（一）互訓——同意之字互相為訓。（二）推因——推其字義得聲之由來。（三）義界——以一句解一字之義。而漢儒一則去古未遠，再則學有師承，他們對於經典的詮釋多有根據，而又能溯其原委，不穿鑿附會、不無憑臆說。漢儒的

詮釋經典固有其價值與歷史地位，但是他們對虛字的處理，無疑是繳白卷。他們對於虛字的處理往往以語詞搪塞，忽略而不顧。其實，一般稍微有古典訓練的知識份子都知道虛字關係整句的文意。如果虛字不得其解，往往不是認為虛字是無義的語詞，便是以實字的義去詮釋虛字，結果於了解經典的古義、本義仍舊是扞格難通。

對虛字的探討，比較有系統的特書，首推清儒劉淇的「助字辨略」。「助字辨略」詳贍博洽，可稱是虛字的筆路藍縷的開路者。而王伯申（引之）的「經傳釋詞」條例謹嚴，他不但就虛字以求實義，而且援據賅洽，探賾究微，被評譽為「發先儒未發之覆、解後人不解之惑」。步踵繼起、犖犖大者有王念孫的「讀書雜誌」、王引之的「經義述聞」、俞樾的「羣經平議」、「諸子平議」、「古書疑義舉例」、楊樹達的「詞詮」、章炳麟的「新方言」、馬建忠的「文通」等，對於虛字的處理或補其闕、或正其誤、或廣其例、或衍其義，都有超軼舊有的成績。

而王叔岷教授在校勘的功力與成績，十幾年前就有目共睹。錢穆教授就一再稱譽他的「莊子校釋」與劉文典（叔雅）的「莊子補正」是近人對莊書的校勘最詳備的著作。而又肯定「莊子校釋」用力尤勤，對於莊子原文摘句校釋，至為詳盡。對郭象（子玄）之區分篇第之不當也有所辨正，對劉文典的「莊子補正」又多所訂正。錢穆教授嘉許他英年好學，前途未易計量。從他對於「史記」、「文心雕龍」等書的勘證、箋釋，便可印證。他的近著「古書虛字新義」，取證宏博、說義精賅，在同類的著作恐怕尚無法找出第二人。

王教授寫作「古書虛字新義」的動機有二，一則是激賞清儒吳昌瑩的「經詞衍釋」對虛字詮釋博精廣引且又增益殊多新義。再則認為裴學海的「古書虛字集釋」雖有採取前人精義、訂正前人譌誤、創立新見，集討治虛字之總成績，但是却也有孤證不足據、釋義未允、證據有誤等諸多有待商榷的闕失。一九六三年歲暮，王教授在新加坡大學漢學系利用授課餘暇，對虛字新義的詮釋時有創獲，而又往往與吳氏「經詞衍釋」、裴氏「古書虛字集釋」的說法有冥冥偶合。間或不少虛字新義為吳裴二書所無，而完全虛字四十二、八十條新義，皆前賢所未涉及者。王教授自謙「其中往往本孤證立說，自信大都可據，姑待他日之博徵廣驗耳」。十餘年來，王教授仍焚膏繼晷，兢兢業業的校釋古書，且又特別留意虛字的詮釋，又時有創獲，於是將舊稿重新改寫為專書，計收虛字九十九、二百六十六條新義，將吳裴二書所無諸條輯錄成「古書虛字新義」。他祈望拋磚引玉、集思廣益，冀勉後進繼續研討、融會引伸，完成一部博大精深的「古書虛字集證」，以嘉惠士林。

「古書虛字新義」的寫作體例嚴謹，先列虛字，次釋其義，次舉例證。釋義採取「某」猶「某也」的方式，據前人研究歸納漢儒注經用「猶」的術語之例有三，一是意思本來不同，然輾轉可通，所謂義隔而通。二是以今喻古。三是從聲音推求語詞音義的來源，而藉以釋其命名之由來。一個虛字往往有數種彼此涇渭分明的用法，如果讀者不釐清其界說，而就輕妄斷以己意，往往不是誤解古義，便是曲解本義，欲避免曲解或誤解，唯有多藉助尋求古籍的例證。「古書虛字新義」的舉證程序是標出某書一段原文，裏面有虛字「某」，再舉他書或別版本的

虛字「某」並作「某」，從而斷定「某」與「某」同義。或是以某書一段原文，裏面本身的虛字「某」與「某」互文，從而斷定「某」與「某」同義。或是以某書一段原文的註釋，以「某」解「某」，從而斷定「某」與「某」同義。而王教授舉例證，除卷帙浩繁的經史子集不計外，特重類書，像「太平御覽」、「羣書治要」、「初學記」、「意林」、「藝文類聚」等。而最難能可貴的是王教授舉例證也沒有文人相輕或貴古賤今的陋習，既有顧炎武的「日知錄」、俞正燮的「癸巳存稿」、王應麟的「困學紀聞」等鴻儒鉅篇，也有近人或晚輩像車柱環、錢穆、丁樹聲、尹仲容、歐韻芳、鄭良樹等人在整理校勘古書的成績。而王教授對「前人所未發」的虛字詮釋，也不信口雌黃或盛氣凌人武斷指責前人的說法，他僅臚列與前人相異的見解，往往只說終覺不安、終是臆說、或是終嫌牽強、仍是曲說，或是舊解諸家未留意耳，然後再依據體例娓娓伸說個人的見解，務使古籍文意粲然明白，僅僅從這個角度便不難窺測一個學者謙遜而嚴謹的治學態度。

無可諱言，今天我們的古典訓練是無可奈何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西方的漢學研究又有逐漸凌駕我們日益式微的古典研究的趨勢，當然因為囿制於彼此的語言文字、思維方式，因為彼此的生活形態、風格習慣的截然差異，他們難免有隔靴搔癢的見解，他們難免有嚴重偏見的結論。雖然我們或許對他們的見解或結論不滿意，但是對他們研究古籍的方法却不可輕易抹煞或蔑視。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，如果我們的古典研究始終停留在鈺釘的考據，始終停留在校釋或今註今譯的層面，而沒有突破傳統的窠臼，那麼如果再口口聲聲說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遺產，那恐怕也是痴人說夢。